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黄建秋 著

史前考古学方法与实践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项目

黄建秋 著

史前考古学方法与实践

Copyright©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前考古学方法与实践/黄建秋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12

ISBN 978-7-108-05165-3

I. ①史… II. ①黄… III. ①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国
IV. ①K871.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7735 号

责任编辑 麻俊生

封面设计 路 静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22

字 数 360 千字

定 价 64.00 元

百年传承铸学魂(总序)

南京大学历史系有两个源头。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两江总督刘坤一邀请张謇、缪荃孙、罗振玉等商议办学事宜,旋即上《奏陈筹办学堂情形折》,其中称“江南地大物博,素称人文渊薮。省会高等学堂规模必求宏敞,俾可广育人才”,是为三江师范学堂开办之始。刘坤一未几即病逝,其继任者为洋务派名臣张之洞。张之洞再上《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清廷准奏。1903年9月,三江师范学堂在前明南京国子监旧址开学,设有历史科,学制4年,此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之肇始。之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国史科、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部历史科、东南大学文理科史学系、中央大学历史学系等阶段。

1888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南京干河沿创办了汇文书院(The Nanking University),由学贯中西的美籍加拿大传教士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担任院长。1910年,汇文书院合并位于南京的另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宏育书院(1907年由基督书院和宏智书院合并而成),金陵大学堂(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因此正式成立。金陵大学建立之初即设有历史学科。

自1903年至1949年,历经4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从蹒跚学步的婴儿成长为英俊彪悍的壮汉,虽历经风雨,但其长期积淀形成的学术传统赓续不断,蜚声海内外。1952年院系调整,原中央大学史学系、边疆政治系和金陵大学历史系合并,形成现

今学术底蕴深厚的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基本学科架构。

110年来,南京大学历史学大师辈出,柳诒徵、徐养秋、陈汉章、雷海宗、郭廷以、朱希祖、金毓黻、沈刚伯、贺昌群、缪凤林、蒙文通、商承祚、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郑鹤声、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陈恭禄、陈登原和王伊同等,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严谨求实”学风的确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南京大学历史系培养的学生已超过6 000人,其中本科、专科生逾4 000人,硕士、博士研究生2 000余人,他们或为学界翘楚,或为政界精英,或为商界巨擘,群星璀璨。如1923年毕业的南高师国文史地部第三班,即走出了著名史学家缪凤林和向达,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和张其昀,以及著名图书馆学家陈训慈。此外,著名历史学家束世徵、郭廷以、王聿均、唐德刚、吴天威、章开沅、李时岳、王觉非、蒋赞初、茅家琦、梁白泉、张宪文、陈得芝、魏良弢等,均为本系毕业生。

学衡派是南京大学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术流派,而历史系教授则为其学术中坚。柳诒徵先生所阐述的《学衡》杂志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①在《学衡》杂志的旗帜下,一群以本国固有文化为根本的学者,展开实证研究。对于国学,他们主张“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于西学,他们主张“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反对“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②学界对于学衡派“攻击新文化运动”、“复古倒退”的传统定论显然并不公正。现在看来,学衡派所倡导的兼采中西文化之长的观点,倒是显得更加理性。历史已证明,《学衡》杂志及学衡派的主张和追求,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学衡派的为学宗旨和治史方法,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历经政治运动的冲击,师资与学科结构遭受了重创,但学术传承却从未间断。在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陈恭禄、王棣、刘

①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民国十一年1月)。

②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民国十一年1月)。

毓璜、洪焕椿、茅家琦、王觉非、蒋赞初、陈得芝、魏良弢、蔡少卿、张宪文等一批著名学者的引领下,形成了今天的学科结构与科研格局,也源源推出了影响中国史学进程的良史佳作。

为推动学术发展,总结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成果,激励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人潜心治学,我们编集了这套《南京大学史学丛书》,以图继往开来,克绍箕裘,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必须强调的是,这批丛书仅仅是南京大学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的展示。

2010年4月20日,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樑先生与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教授签署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协议,由台湾光华教育基金会和南京大学“985三期”项目按照1比1.5的比例,共同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资助南京大学的人文学科建设。《南京大学史学丛书》得到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全额资助,谨此鸣谢。

陈谦平

2013年1月于南京

目 录

考古学方法篇

中日考古类型学的比较分析	3
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	
——以良渚文化钺柄端饰和尾饰研究为例	26
跨文化分布遗物研究论纲	36
陶器形态与折衷陶器研究	44
磨制石器痕迹研究初探	
——以骆驼墩遗址出土石器为例	54

玉石器研究篇

史前玉器起源研究的几个问题	67
良渚文化治玉技法的实验考古研究	78
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玉器纹样初论	110
良渚文化玉琮研究	134
良渚文化分布区以外的史前玉琮研究	158
良渚文化玉梳背饰研究	178
凌家滩墓地出土玉龟和龟形器研究	190
凌家滩花边玉璜研究	197

国外磨制石斧、石镞研究述评·····	210
新岗遗址出土石器的初步研究·····	219

墓葬研究篇

好川墓地的分期及社会结构·····	265
花厅墓地研究·····	284
从墓葬看大汶口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结构·····	312
三里河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	328
后记·····	341

考古学方法篇

中日考古类型学的比较分析

考古类型学是考古研究中整理分析资料的重要方法,也有学者把它看作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①100年前奥斯卡·蒙德留斯系统地归纳并推广类型学方法,它被很多地区 and 国家的考古学者接受,有力地推动了各国考古研究向前发展。日本的考古类型学研究以其细致入微而独树一帜,中国考古学者也在类型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与日本考古类型学相比,我国的考古类型学研究还有一定的提高空间。本文就中国考古类型学与日本考古类型学略作比较,找出我们考古类型学研究中的问题,并就解决这些问题作些思考。

一、日本的考古类型学

根据铃木公雄、户泽充则、横山浩一和高桥龙三郎等知名考古学者的归纳和笔者的认识,这里把日本考古类型学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萌芽期,相当于20世纪10年代。在美国纽约自然史博物馆留学的松本彦七郎回到日本后,1919年在陆前国宝峰遗址的发掘中成功地运用了地层学原理划分地层,他以地层关系为依据确定陶器的年代,根据各个时期常见的纹样对陶器进行分类,从进化论的角度论述了装饰的产生、发展和衰退的过程。松本称这种以生物进化不可逆性的进化论为原理探索陶器变迁的方法为“纹样化石学”,这种方法后来成为绳文研究先驱山内清男的“纹样带系统论”的源泉之一。一般认为松本“纹样化石学”的提出标志着日本考古类型学的诞生。

第二阶段是发展期,相当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1916—1919年先后在

^① 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文物》1983年第5期,第60—69页。

英国、德国等游学的滨田耕作在 1919 年回到日本后,执教于京都大学新设的考古学讲座,讲授类型学研究方法,为日本考古学界培养了一批学术带头人。他于 1922 年出版了专著《考古学通论》,书中系统地介绍了蒙德留斯的类型学。他在 1931 年翻译出版了蒙德留斯的类型学专著《考古学研究法》,为在日本开展考古类型学研究作好了准备。与此同时,中谷治宇二郎率先在考古研究中使用“形式”、“型式”和“样式”等概念。他所说的“形式”(form)相当于生物学上的分类单位“种”,其下再分型式(type)和样式(style)。这个分类方法虽然没有被绳文文化研究者所接受,但是却被弥生文化研究泰斗小林行雄批判性地接受了下来,它成为弥生文化研究中所用的类型学方法的源泉。

1932 年山内清男在研究绳文文化时指出,绳文文化的“型式”概念是反映地域性差异和时代早晚的年代学单位,他留下了陶器分类要“分到不能再分为止”的名言。山内虽然没有提出相当于小林行雄的“形式”的概念,但是他使用的“器种”一词与其相当。山内的“型式”实际上相当于小林行雄的“样式”,他提出的“纹样带系统论”为绳文文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以上两位学者为日本考古学建立起了各具特色的绳文文化和弥生文化类型学研究体系,它们的提出标志着日本考古类型学有了很大的发展。

第三阶段是成熟期,相当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70 年代。这个时期,类型学研究经受了两次考验。

第一次考验发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正当绳文文化研究日渐深入的时候,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江马修在从事了多年考古发掘和研究后,以笔名赤木清在他自己主编的地方性杂志《飞弹人》上发表了题为《考古学的遗物と用途の問題》的文章,批判以山内清男、甲野勇和八幡一郎为代表的编年派学者偏重编年研究而不注意遗物用途研究的现象。他强调研究遗物用途的重要性,认为考古学的终极目标是弄清楚聚落、家庭等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①这篇文章引发了日本考古学史上编年派与用途派之间展开的“飞弹人争论”。对此,甲野勇在《飞弹人》上发表了题为《遗物用途問題と編年》的文章,他在承认自己存在很少研究遗物用途的弱点之后指

① [日]赤木清:《考古学的遗物と用途の問題》,《ひだびと》第 5 年第 11 号(1937 年),转引自[日]高桥龙三郎:《五ひだびと論争》,[日]櫻井清彦、[日]坂詰秀一编:《論争・学説 日本の考古学》第 3 卷《縄文時代》(2),东京:雄山阁,1987 年,第 123—149 页。

出,为了克服这个弱点,首先要全面推进编年研究,确立日本石器时代的编年是当务之急,它是解决遗物用途的快捷方式。他提出,考证所有遗物的用途并通过它们复原当时的社会生活是考古学赋予我们的使命。随着石器时代编年的完善,必须反思以前惯用的只挑选特殊遗物,站在朴素进化论的立场上,根据随意的分类讨论遗物用途的研究方法。与编年派相比,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许多场合被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器物只是体现了该物的制作方法在技术上的早晚而不能体现该物出现的实际年代。这就坚定了研究遗物的基础是年代学的信念。因此在考证遗物用途的同时,必须考虑到遗物随时代推移而变化的情况。考证遗物的用途确实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而将遗物的用途和编年结合起来才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变迁的一个断面。^①接着,江马修在《飞弹人》上发表文章回应,他指出遗物用途研究不应该和编年研究割裂开来,主张始终只研究物的考古学者必须和社会经济史研究者结合在一起。八幡一郎也在《飞弹人》上发表文章参加论战,他认为在进行编年之前研究遗物用途将会扰乱阻碍考古学研究,它所造成的危害要比把遗物用途研究推后造成的危害大得多,他强调在考证器物用途之前,必须确定器物在时空框架内的位置。^②

这场著名的“飞弹人争论”虽然比较激烈,但是对日本考古类型学研究没有造成不良后果,运用类型学方法建立起来的绳文陶器编年网成为考古研究的主流。当时考古学者除了考订各种文物在年表上的位置之外,开始致力于研究与绳文文化起源有关的最早陶器类型。这与当时处在二次大战前和大战期间的历史背景有关,在皇国史观意识形态的压力下,考古学者回避现实,沉浸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气氛中,埋头于编年研究。50年之后,高桥龙三郎对这场争论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他认为,江马修是高屋建瓴地议论日本考古学前进方向,而甲野勇和八幡一郎是站在反省过去的立场上提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观点。^③

① [日]甲野勇:《遗物用途问题と编年》,《ひだびと》第5年第12号(1937年),转引自[日]高桥龙三郎:《五ひだびと论争》,[日]樱井清彦、[日]坂诘秀一编:《论争・学説 日本の考古学》第3卷《绳文时代》(2),第123—149页。

② [日]八幡一郎:《先史遗物用途の問題》,《ひだびと》第6年第1号(1938年),转引自[日]高桥龙三郎:《五ひだびと论争》,[日]樱井清彦、[日]坂诘秀一编:《论争・学説 日本の考古学》第3卷《绳文时代》(2),第123—149页。

③ [日]高桥龙三郎:《五ひだびと论争》,[日]樱井清彦、[日]坂诘秀一编:《论争・学説 日本の考古学》第3卷《绳文时代》(2),第123—149页。

第二次考验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一些考古学者批评当时的陶器分型分式太细了,他们认为陶器是古人的生活用品,是古人制作的产品,过细的类型学研究实际上是远离了人间。^① 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见物不见人。有意思的是 10 多年前旗帜鲜明地反驳遗物用途论的甲野勇也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批评,他说最近的研究只关注器物的形态和纹样等细微的地方,见不到研究者头脑里装有制作陶器的人,见不到把陶器和人类生活串起来的东西。他对不重视研究隐藏在陶器背后的人的意志、行为、技术及人组成的社会的现象表示不满。^② 当时有考古学者就过细的类型学研究发出诘问,“编年要编到何时为止?”^③ 时任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考古第 2 调查室室长的佐原真对此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要问编年编到何时为止,答曰:编到考古学消亡为止。一方面从纵横两个方面充实编年表,另一方面实现考古学的本来目标”。^④ 这场争论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但是对考古类型学没有丝毫不良影响。

随着日本经济起飞,全国各地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兴起,大量出土资料的积累促进了类型学研究的发展。各地考古研究者建立起了本地考古文化编年网,建立了独特的类型学研究体系,为日本考古学研究构建了细密的时空框架。

第四阶段是大发展时期,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这个时期,在器物分类方法方面有了一定的进展。首先是旧石器时代研究大家加藤晋平注意到美国学者莫维斯(H. L. Movius)的属性分析方法,率先在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引进了这个方法,随后又引进了统计学方法并用计算机进行统计分析。^⑤

佐藤达夫在研究绳文文化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集不同文化纹样于一身的陶器。田中良之在研究九州中部地区的消磨绳文文化传播过程中也发现了这种现象,并

① [日]高桥护:《土器とせぬか型式》,《考古学手帖》1958 年 4 月,第 13—27 页;[日]冈本勇:《Ⅱ日本考古学の发达 绳纹文化》,[日]三上次男编:《日本考古学讲座日本考古学研究的历史と现状》第 2 卷,东京:河出书房,1959 年,第 37—59 页;[日]大井晴男:《型式学方法への试论》,《考古学杂志》第 55 卷第 3 号(1970 年),第 1—23 页。

② [日]甲野勇:《绳文陶器のはなし》,东京:世界社,1953 年。

③ [日]藤田森一:《いつまで编年をやるか》,《考古学ジャーナル》第 35 号(1969 年),第 1 页。

④ [日]佐原真:《一九七一年の考古学界の动向》,《考古学ジャーナル》第 74 号(1972 年),第 3—13 页。

⑤ [日]加藤晋平、[日]畑宏明、[日]鹤丸俊明:《エンドスクレイパーについて》,《考古学研究》第 55 卷第 3 号(1970 年),第 44—74 页。

把这种集不同文化纹样于一身的陶器称为折衷陶器。他在探讨折衷陶器出现的原因时,发现了文化传播和吸收的过程。^①

几乎与此同时,小林达雄把“样式”、“范型”等概念引进到绳文文化研究当中,并重新定义了“形式、型式、样式、范型”等概念。^② 不过由于“形式”和“型式”在日文中也是同音字等原因,所以这套概念未被普遍采用。

还有些年轻学者利用属性分析方法开展类型学研究,据此探讨古代社会文化交流及其对古代社会和人们的精神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松本直子运用陶色和壁厚两个属性对九州西北部绳文后期黑衣陶器进行了统计分析,把它们与朝鲜半岛南部新石器时代陶器作了比较研究,发现这种特殊的黑衣陶器发源于朝鲜半岛南部,后来传播到日本九州北部。松本用认知心理学解读这种文化现象,她认为这个现象要么是九州西北部的一些陶工积极引进容易认识和模仿的物质文化的结果,要么是他们无意识地接受了这种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这种对待外来文化的心态成为后来导致九州西北部地区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即开始稻作农业、使用金属器)的基础。^③

上述学者的努力丰富了类型学研究的手段,拓展了考古学研究的内容。当然,即使在今天也不是所有学者都赞成开展如此细致的类型学研究,也不是所有学者都能够熟练地运用这种富有特色的类型学方法开展器物研究。在美国学习考古学的日本留学生古城泰对重视类型学研究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古城泰对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黑美萨地区(Black Mesa)凯耶塔-阿纳萨兹人(Kayenta Anasazi)聚落作了分析,他根据居住面出土的陶器、建筑用木材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推测房屋的使用年代和各式陶器的使用年限,结果发现陶器的平均使用年限大概不超过4年,形态上有继承关系的陶器共存时间长达65—166年。他据此认为,美国学者马尔默(M. P. Malmer)等提出的类型学方法的必要前提没有普遍意义:(1)在一个变化序列中,前后连续的样式的制作在时间上不重合;(2)当一个集团持续发展时,该集团

① [日]田中良之:《磨消绳文土器传播パモセス—中九州を中心として》,《森贞次郎博士古稀纪念 古文化论集》(上),福岡:森贞次郎博士古稀纪念论文集刊行会,1982年,第59—96页。

② [日]小林达雄:《タイポロジー》,[日]麻生优、[日]加藤晋平、[日]藤本强编:《日本の旧石器文化》(1)总论,东京:雄山阁,1975年,第156—169页。

③ [日]松本直子:《认知考古学的視点からみた土器样式の空間的変異—縄文時代後晩期黒色磨研土器样式を素材として—》,《考古学研究》第42卷第4号(1996年),第61—84页。

的物质文化样式的变化也是持续不断的。他提出,在编年时应该引进数量的观念,不必浪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细致的分型分式(完整器能够分型分式,而碎片不能分型分式),应该把用于编年的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其他方面的研究上。^①从目前的情况看,他的意见没有影响到日本类型学研究,日本考古学界甚至还致力于加强类型学研究。笔者在下文还将利用他提供的资料进行类型学分析,从中发现不从事详细的器物类型学研究使他本人的研究存在不少问题。作为旁观者,笔者觉得现在否定类型学在考古研究中的作用为时尚早。

1997年日本考古学会为了纪念该学会创立100周年(创立于1896年),不仅组织各个领域の中堅力量总结各个研究专题中的类型学研究成果,而且还约请了几位知名学者撰文介绍法国、古希腊、古埃及、古地中海沿岸、西亚、东南亚及中国的类型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研究成果,编辑外国考古类型学研究专集的几位学者在以《现在为什么(还要讲)类型学?》为题的编后语中指出,编辑该专集的目的是,尽量提供国外考古类型学现在而不是100年前的类型学研究,尤其是对日本学者有启发和教益的类型学研究实例。他们指出,不仅不能因为(类型学研究)方法本身存在有待改进之处而放弃——至少目前是不应该放弃——以类型学为轴心的考古学战略,而且类型学研究应该更上一层楼。^②

总体来看,日本考古类型学在发展过程中,虽然经历过曲折,但是它步步深入,为深入研究古代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的考古类型学

与日本考古类型学相比,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发展则没有这般顺利。一些学者已对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发展历程作了回顾和总结,这里不再赘言。为了比较说明,这里择要叙述有关情况。

根据陈星灿的意见,1949年以前的中国考古类型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21—1931年,类型学研究初步开始;第二个时期是1931—1937年,类型

① [日]古城泰:《型式学な方法の再检讨》,《考古学研究》第44卷第4号(1998年),第34—54页。

② 这些论文分别刊登在1997年出版的日本考古学会发行的《考古学研究》第82卷第1—4号和1998年出版的第83卷第1号。其中第4号是外国考古类型学研究专集,关于中国考古类型学的文章有2篇,一篇是大贯静夫的《中国における土器型式の研究史》,另一篇是广川守的《殷周青铜器研究の現状と課題—型式研究を中心—》。

学初步形成;第三个时期是1937—1949年,类型学方法得到完善。^①

在类型学研究的初步开始阶段,布日耶等对水洞沟、萨拉乌苏遗址出土的石器等进行分类研究。安特生对沙锅屯出土的遗物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形态研究,他对戈的形态演变的研究堪称佳作。李济特别是梁思永对西阴村遗址出土的陶器的研究,说明中国学者开始运用类型学原理研究出土遗物。

在类型学初步形成阶段,梁思永1931年在后岗的研究中已经运用了类型学原则。巴尔姆格伦在研究半山和马厂陶器的关系时已经成功地运用了类型学原则。1935年郑师许、1937年胡肇春和滕固分别翻译了蒙德留斯的类型学研究方法专著。李济对城子崖陶器的分类则是中国学者在类型学研究方面所作的尝试。

考古类型学完善阶段,李济对殷墟出土铜器的研究、裴文中对陶鬲和鼎的研究,及苏秉琦对陶鬲及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的研究,特别是苏秉琦对陶鬲的研究成果对后来的类型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尽管对照蒙德留斯的方法,苏秉琦的陶鬲研究不能说是完美无缺,但是他的路子走对了,为他日后提炼出来的区系类型学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如果说1949年以前的类型学研究处在摸索和逐步完善阶段,那么1949年到1975年这段时间则是类型学研究发展缓慢的阶段。1949年以后,本该继续发展的类型学研究由于受到前苏联批判包括类型学在内的所谓资产阶级考古学的影响而中断,^②在一切学前苏联的大环境下,作为连锁反应,苏秉琦的类型学研究受到大学生们的批判。^③即使在前苏联1960年承认放弃类型学等研究而削弱了考古学的资料学基础后,^④我国考古界却未跟风对此进行反思。不过当时也有考古学者在进行器物类型学研究,比如石兴邦对仰韶文化彩陶鸟纹和蛙纹的研究是相对精彩的个案。^⑤苏秉琦不可避免地受到批判,但是他对批判中提出的“见物不见人”的问题作了反思。他在研究洛阳中州路(西工段)东周墓中,把类型学研究对象由单件器物

①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51—162,239—250,314—329页。

② [前苏联]A. Д. 蒙盖特:《陷于绝境的资产阶级考古学》,《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第73—89页。

③ 北大考古专业资产阶级学术批判小组:《论资产阶级器物形态学的伪科学性——批判苏秉琦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考古通讯》1958年第11期,第19—29页。

④ [前苏联]A. Д. 蒙盖特:《“苏联考古学”中译本序言》,《考古》1960年第3期,第45—46页。

⑤ 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考古》1962年第6期,第318—329页。